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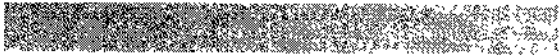
明清道教伦理 及其历史流变

姜生 郭武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国家社科“九五”规划项目

明清道教伦理 及其历史流变



姜生 郭武/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

(川) 新登字 001 号

责任编辑：汪 漪

封面设计：邱云松

技术设计：何 华

明清道教及其历史流变

姜生 郭武 著

四川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成都盐道街3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省印刷协会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mm 1/32 印张 11.75 插页 4 字数 250 千

1999 年 5 月第 1 版 199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220-04447-X/B·195 印数：1—1000

定价：18.00 元

目 录

导 论	(1)
-----	-------

上篇 明清以前道教伦理形成 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第一章 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11)
第二章 隋唐五代北宋时期道教伦理的发展变化	(25)
第一节 生命价值观及修行方式的转变：生命伦理 的革新尝试	(26)
第二节 社会伦理的充实与发展	(54)
第三节 神学伦理的完善与强化	(64)
第三章 南宋金元时期道教伦理的主要特征	(80)
第一节 灵魂成仙说的确立与风行	(80)
第二节 人世倾向的增强	(94)
第三节 科仪符篆的增造与集结	(106)

下篇 明清道教伦理的形成、主要内容及其思想形态的流变

第四章 明清思想文化与道教发展状况·····	(117)
第一节 封建社会的衰落与价值观念的变迁·····	(117)
一 传统意识形态的没落与新思想的出现·····	(118)
二 封建关系的衰变与统治者对道德秩序的渴求·····	(126)
第二节 理学对道教伦理的改造与功能替代作用： 以王阳明为例·····	(129)
第三节 明清道教的发展状况及其危机·····	(144)
一 明清统治者对道教的政策·····	(144)
二 明清道教的发展状况·····	(150)
三 明清道教面临的危机·····	(158)
第五章 明清道教的生命伦理·····	(162)
第一节 明清道教修仙学说的盛熟·····	(163)
第二节 明清道教生命伦理思想的内容·····	(183)
一 明清道教的生命价值观·····	(183)
二 明清道教关于生命转化的理论和操作方法·····	(189)
第三节 出世与入世的统一·····	(204)
第六章 明清道教的社会伦理·····	(215)
第一节 信仰者修仙过程的伦理规范·····	(216)
第二节 明清道教之伦理审美与价值观倾向·····	(222)
第三节 劝善书与功过格的盛行及其思想特点·····	(236)
第四节 道教社会伦理对明清商业伦理的影响·····	(248)
第七章 明清道教的神学伦理·····	(251)

第一节 道法科仪的继续修订·····	(251)
第二节 明清道教神学伦理的形态·····	(261)
第三节 明清道教神学伦理的变化·····	(273)
第八章 明清道教伦理的衰变·····	(279)
第一节 衰变之必然性·····	(279)
第二节 明清道教伦理的世俗化及其衰变·····	(284)
第三节 民间宗教对道教伦理的继承与改造：以三 一教为例·····	(290)
余论 近代以来中国伦理诸问题·····	(297)
附录一 中华文明长存的伦理根源·····	(317)
第一节 世界诸文明兴衰之伦理根源·····	(318)
第二节 中国传统伦理的自反馈与自组织结构·····	(322)
第三节 海纳百川之容与“以夷变夏”之防的有机 结合·····	(327)
第四节 “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的发展战略·····	(331)
附录二·····	(340)
附录三·····	(363)
后 记·····	(368)

导 论

在 16 世纪以前的人类文明历史上，中华大帝国曾以其古老而常盛不衰的文明长期独领风骚。“在中古时期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更先进和更优越。”^① 这是历史学家们公认的事实。在悠久的中华文明发达史上，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文化，留下了许多举世瞩目的发明创造，在人类历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譬如中国人为之自豪、被世界人民视为古代中华智慧象征的“四大发明”，在人类文明进步历史上所产生的推动作用，确实是无法估量的。14—17 世纪之间，欧洲先后经历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其科技文化处于不断前进的时期。但中国科技水平在许多领域都还处于和欧洲不相上下的状况，某些方面的科技水平甚至远强于欧洲。譬如航海技术方面，明初成祖时（1405 年）开始到英宗时（1433 年）止，先后七次遣郑和下西洋，其中已知的四次人员规模都在 27000 人

^① 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中译本，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 年版，第 4 页。作者接着写道：“在 15 世纪时，中国人口众多，有 1 亿～1.3 亿，而当时欧洲的人口为 5000～5500 万，它的文化灿烂辉煌，平原土地肥沃，灌溉发达，与 11 世纪开凿的蔚为壮观的运河系统相连，并形成了一个受过儒家良好教育的官吏管理的统一的等级制政府，这一切使中国社会发达具有一种内聚力，以致外国来客羡慕不已。……中国一贯能够改造征服者，而不是被征服者同化。”然而“明代中国与 400 年前的宋代相比，活力和进取心都大大减退。”见同书第 4—5 页和第 10 页。

以上，所用的巨型海船，在当时世界造船技术中处于前列地位。1533年即明世宗嘉靖十二年癸巳，中国派遣陈侃等出使琉球所使用的巨型海船，就是根据洪武、永乐间（即十四、十五世纪）出使海外诸国所用的巨舟而在福州制造的。按严从简著《殊域周咨录》卷四《琉球》所引陈侃《使事纪略》对其所用巨型海船设备的记述，对照明熹宗天启三年（1623年）意大利人艾儒略所著《职方外纪》卷五《海舶》对当时西洋海舶的记载，可知十四到十七世纪之际的中西海船制造技术，可谓伯仲难分。^①又从随同郑和远航的巩珍所著《西洋番国志》对船队技术装备情况的记载可知，十五世纪初的中国航海活动，已经综合运用天文定位、指南针定向、物标导航、计程计速、气象观测与预报、针路记录和航海图等等多方面的先进技术。中国人这种长期大规模航海活动及其所取得的技术成就，对于促进世界航海事业及其技术的进步、尤其是对15世纪以后欧洲以大规模航海活动为基础的“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到来，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是难以估量的。^②

然而，应当指出的是，在我们探讨中国文明对人类的贡献及其在16世纪以后世界历史上的地位时，有两个方面的问题，应当引起今天中国人的深思：一是不应总是陶醉于诸如“四大发明”等足以自喜的事物之上，因为，毕竟我们曾经以以这样了不起的文明基础而败北于西方文明的侵略；二是必须严肃和认真负责地反省16世纪以来中国文明的发展状况及其教训，除了研究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掠夺对中国文化发展进程所导致的扰乱和

① 有关资料参见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上册，齐鲁书社，1980年，第216—219页。

② 然而就在1433年的最后一次远航过后3年，明朝皇帝即下令禁止建造远洋船只，后又禁止保留超过两根桅杆的帆船。那些拥有远洋航行经验的船员被迫到江河上撑船为生，本来位居世界前茅的航海和造船技术就这样逐渐衰落了。

破坏以外，尤其要从内在的、社会伦理和文化深处，发掘百年近代屈辱历史形成的逻辑必然性。我们的目的应当是从这种探讨中找到 16 世纪以后中国文化深处的症结所在，找到解决问题的答案，并将其提供给肩负历史使命，正在探索重建中国文化、梦想着 21 世纪中国文明时代早日到来的炎黄子孙。这是一个多么令人鼓舞的目标！无论如何，今天的探索，将对 21 世纪的中华文化发展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毕竟，为了今天的中国，我们已经摸索着走过了一个半世纪漫长而坎坷的求证历程。

16 世纪以后中西文明地位的历史性翻转，是一个值得认真思考和反省的重大事件。在这种思考中，中国文化的衰老和拒绝自我调节的弊病，造成社会发展种种问题的恶性循环，使这个昔日骄人的大帝国失去风采，乃至 19 世纪面对远道而来的欧洲炮舰节节败退。诚然，帝国主义列强的坚船利炮，是打乱了中国文明的阵脚，打乱了她那悠长的美梦，使中国人饱尝列强掠夺与欺凌之苦。然而，随着这一切之成为历史，我们的眼光必须转到反思的层面上来：不仅要反思帝国主义列强成功地实现对中国侵略和掠夺的外在原因，更重要的是，还要反思那个面临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而不堪一击的中国文明内部的问题和根源。

近代中国被列强称作“东亚病夫”。然“病夫”之症，岂遽然生于近代？在对那每读必痛的近代历史进行探索研究的时候，我们的清理和解剖对象，难道不应广及包括宋明理学和明清宗教问题在内的中国思想文化？在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明清道教伦理及其所产生的社会作用的性质尤其值得注意。譬如功过格。功过格是中国传统伦理发展中出现的对道德行为管理的理性化（对个人日常道德行为的估价与簿记、汇总核算制度），这与同时期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中出现的经济行为的理性化（如经济活动中合

理的会计簿记与核算制度的出现等),虽然在价值取向上完全不同——前者是指向内在世界,后者则指向外部世界,其思维方法却颇为相似。功过格表明中国文化中早就出现了合理的簿记与核算制度,但问题就在于:在中国,这种道德簿记与核算制度被一再完善和传播于道德而非经济领域,它不断推进的是中国人对自己道德行为的日益精致的管理和检讨手段。然而,在中国这样一个人人关注道德评论的国度里,它使中国人越来越多地学会了的,并不仅是如何使自己拥有更多地受到别人在品德上承认的生活,达到完美无缺的君子理想,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也迫使他们学会如何虚伪,学会通过发掘内部世界的方式谋求自己的生存地位。相反,在同期西方文明中,合理的会计簿记与核算制度在经济活动中的出现,首先使他们受益的是能够更精明地管理他们的资本而非道德行为,推进对经济活动管理手段的合理化,更多地思考如何利用尽可能小的成本创造尽可能多的物质财富,尽管,众所周知,这种物质财富的“创造”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剥削他人劳动的基础之上,但它最终则无疑是指向自然界,推动人们更有效地、更多地从外部世界——大自然攫取物质财富。

从理论结构上看,居主导地位的社会伦理是联结社会分子的纽带,是特定社会赖以存在的中间环节。在这里,伦理犹如躯体中的筋腱、神经和经络系统,发挥着联结机体内部不同组成部分、传达各部分之间力量和信息的功能,使整个躯体在力量和信息等各方面的整合与输出得到最终实现。因此,特定时代的伦理系统,对社会能量的指向具有重要的构造作用。宗教伦理观念则是以宗教神秘主义思想为外衣,它不仅包裹诸多人类社会合理的和高尚的伦理与价值观念,而且也可能包含诸多保守的消极的伦理道德成分,通过宗教的语言和信仰的方式推行和作用于社会,

而且由于宗教神学存在的相对稳定特点，使社会能量组合以十分独特的方式得到整合和长期保持。“在一切理想和价值所在的彼岸世界，宗教发现了人类存在及其生活的终极意义，并将其纳入神圣的神学系统，教人顶礼膜拜，试图让整个类把它看作是生活的真正价值，这就是神学的功能所在。”^① 它以其特有的方式，在一定程度和层面上，起着连接和维护社会机体正常秩序的功能。传统伦理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经络，它传递着整个社会系统的思想，维系着社会的整体性和自我存在的合理性。道教伦理则以长生成仙为理想，推展中国传统伦理观、价值观和审美观，在中国民众的生活方式和伦理与审美意识深处，往往具有“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作用。应当看到，“在本质上，宗教没有任何玄妙的理论的目的，它所有的只是现实的社会的目的，即社会的控制与秩序。从其现象而言，道教所关心的是如何使作为个体的个人生命的不死和成仙；而在本质上，同一切宗教一样，道教的宗教体系的实际功能指向则是社会。在这里，道教——以及一切宗教——贯之以‘神道设教’的社会控制本质，便至为清晰地凸现出来了。”^② 问题在于如何利用宗教的这种功能使其对社会发展产生积极的影响。

历史上，荀子提出的“兼陈万物而中悬衡”的方法论，在道教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历程中，曾经起到极为重要的构造性影响。在百家争鸣后期形成的荀学，之所以能够为两千多年中国封建文明提供哲学上的支持，主要还是由于它所内在地具备的方法论结构：“兼陈万物而中悬衡”。这是它的灵魂。“兼陈万物”是统治

① 姜生：《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中国道教伦理研究》，巴蜀书社，1996年9月版，第35页。

② 《宗教与人类自我控制——中国道教伦理研究》，第61页。

者的思想方法论，“中悬衡”则是为使各种思想以集权政治为中心的整合成为可能而提供的思想导向。“兼”则能容，则可包罗天下于一囊，有“衡”则有正统可循，从而可以制群伦，策民心，驱民力。如是，则天下外似散漫而神则一，可令帝王“无为而无不为”。^① 近代学者所谓贯穿二千年封建社会的乃是荀学的说法，说到了问题的实质。我们可以从中国封建社会历史的两头来看这一特点。首先，汉儒董仲舒向武帝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战略，并不等于汉代思想领域是儒家独步天下。历史的事实是，恰恰在董仲舒变儒为术的时代，中国思想界开始了两千年一贯的杂纳百家为我用的大趋势。与其同时代以刘安为首的《淮南子》学派则以道融儒。继而道教产生，走出了一条兼容百家的道路。其次，宋明理学的形成，尤其明显地采取了综合各家为我所用的思想方法。理学有其思想独特性。虽然理学家们素好以儒家道统的继承人自居，但在事实上他们杂揉儒、释、道三教思想的方法，决定了其思想乃是继承发展三教而非儒家一派学说的结果，正因如此，理学在明清思想文化领域对传统的三教思想体系发挥了某种替代性功能。这也是由这一整个时代的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不幸的是，到了封建社会后期，随着封建思想文化的这种“自我完善”过程的推进，同时也经历了它的衰朽和老化，中国文化的这种吸纳与同化能力已逐步丧失，无力对外来文化因素进行批判的解析、改造、同化，因而对于外来文化，或视若天方夜谭，或待若洪水猛兽。犹如老朽衰者之肠胃，无法消化吸收生冷之物。那么，是把这副偏好米面的老肠胃割除，换或长于消化牛

^① 见《道德经》第三十七章、第四十八章。

肉的新肠胃，还是调养这米面肠胃使之对那夹生的牛排也同样能够消化吸收，以求强筋壮骨、刚柔相济？这是当今中国人所应思考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近代中国文化的问题，关键就是这种运行了将近二千年、逐步改进和完善使之形成越来越精致的“相对合理结构”的封建思想文化体系，逐渐形成了与它的主要经济基础——自然小农经济相一致的——自足的、完备的、自平衡的系统，使其不仅长期延续，而且长期相对稳定。这就导致排斥外来文明、不愿接受新文化因素的特点。皇帝们做着天朝帝国的美梦，他对于任何外来的人们只有恩赐。当初佛教传入、道教产生、儒家思想宗教化的时代所体现出的中国文化的巨大的兼容性，到后期已被实质上是自我欺骗的自满自足意识所取代。这是近代中国的悲剧之所以能够上演的内在根源。外来的侵略和掠夺，严重破坏了这个东方帝国的美梦，使它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无法理解和摆脱这一重大的挫折。继而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出现的新思潮，对此历史状况进行了深刻反思和应对。但却得出了否定传统文化，赞美西方文化的结论，此虽有其存在的历史合理性，却因其所处的历史背景注定其具有思想和时代的局限性。

对于包括宗教在内的传统文化，应当采取批判继承的态度，这样才能使文化能够不断地推陈出新，自我发展。这也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态度。道教从产生、发展、繁盛到衰落的整个过程，都处在封建时代，它的思想方法和社会行其“教化”的宗旨，自然无逃于封建价值观念和思维模式。因此，道教思想体系中自然吸纳了许多属于封建意识形态的东西，这也是符合思想史发展规律的。任何时代的思想文化，莫不以时代之本质需要为思维的激励因素，于是以解决现实问题为目的的形而上的哲学体系，也就

无不以解决人类遭遇之诸多现实问题为生长起点，内在地构造自己的解决方案，形成自己的思想线索。然而要让这种方案和线索成为有生命力的有社会意义的东西，就必然要吸取各方面的反馈信息，才能形成一系统化的哲学。尤其在今天，如果要发挥传统宗教文化的积极作用，对社会产生有益的影响，就必须以现代社会生活为基础进行自我改造，以适应现实的需要。毫无疑问，现代社会对于任何积极有益的思想文化都是需要的，关键在于要能够符合时代特点，能够为社会所接受，能够成为社会生活中活的有机的组成部分。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考察整个世界文化的发展形势，既不能闭门造车、故步自封，也不应妄自菲薄，丧失信心。

历史又将翻过一个世纪，是重新审视近代史的时候了。要理智地反思中华文明的过去，发现中国近代苦难命运的中世纪基础，指导今天的思想文化重建。其中，社会道德的拯救和重建已迫在眉睫。这是今天的每一个中国人都无法推卸的历史责任。



上 篇

明清以前道教伦理形成
和发展的历史线索

第一章 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的形成与初步发展

秦汉时期的中国，在大一统的国家政治经济格局形成以后，思想文化、宗教信仰和伦理道德等若干重要领域仍存在着深刻的危机，它主要表现为一种由于社会转型而致的结构性、观念性而非要素性的危机，对既存之文化要素，在新观念、新价值基础上加以融摄、整合与升华，成为历史的要求。这是制约一整个时代并且关系着中国文化与社会之发展前途的重大问题。秦汉之际的政治家、神仙家和思想家们，虽已有所察觉，但显然都无力解决这一重大问题。而他们所提出的一些思想，及其所推出的一些新思路、新观念，对于道教及其伦理的形成，则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汉魏两晋南北朝是道教伦理体系形成和初步发展的时期。^①道教伦理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不仅融摄并整合了前道教中国文化中的传统伦理要素，而且受到秦汉信仰—伦理危机的刺激与时

^① 本节内容主要参考姜生《汉魏两晋南北朝道教伦理论稿》，四川大学出版社，1995年12月版。